

向达 著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教育出版社

文庫

湖湘



向达 著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教育出版社



湖湘文库
甲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向达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355-7121-2

I. ①唐… II. ②向… III. ①长安 (历史地名) —文化史—唐代②西域—文化史—唐代 IV. ①K294.11②K2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1822 号



湖湘文库

(甲编)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著 者 向 达
责任编辑 符本清 喻亚中
特约编辑 左 峰
责任校对 李黎峰
装帧设计 郭天民
出版发行 湖南教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epi.com>
电子邮箱 postmaster@hnepi.com
地 址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印 装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
开 本 960×640 1/16
印 张 41
字 数 455000
书 号 ISBN 978-7-5355-7121-2
定 价 82.00 元

湖湘文库
PDG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 问 张春贤 周 强 徐守盛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文选德 孙载夫
戚和平 谢康生
组 长 蒋建国 路建平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 员 李友志 钟万民 姜儒振 魏 委 吴志宪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周用金 朱有志
王晓天 钟志华 刘湘溶 肖国安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魏 委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 员 唐成红 陈祥东 肖 荣 苏仁进
田方斌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丁双平 朱汉民 曾主陶
委 员 李建国 易言者 李小山 刘清华 黄楚芳
黄一九 胡 坚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章育良 杨 林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据原本影印及数据光盘三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前 言

荣新江

1

向达先生，1900年生，湖南溆浦人，字觉明，笔名方回、佛陀耶舍，土家族。1919年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东南大学）。1924年毕业，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从事翻译和研究工作，重点在中西交通史领域，译有加特著《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传入欧洲考》（1929年）、班兹著《史学》（1930年）、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伦理学》（1933年）等，并发表论文《龟兹苏祇婆琵琶七调考原》（1926年）、《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1929年）、《论唐代佛曲》（1929年）、《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1930年），可见先生著译之勤。1930年，转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继续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史，翻译有关中西交通和西北史地的外文名著。除翻译《甘地自传》（1933年）、帕克《匈奴史》（1934年）、《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36年）等书外，撰写发表了《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1930年）、《论龟兹白姓》（1931年）、《中外交通小史》

(1933年)等论著，特别是长篇论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作为《燕京学报》专号发表(1933年)，进一步确立了先生在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1933年，兼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等课程。

1935年秋，向达先生以北平图书馆交换馆员身份，先到英国牛津，在包德里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工作，检索馆藏《永乐大典》、明版书二百余部、太平天国史料，抄录有关中西交通和太平天国方面的史料，撰有《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瀛涯琐志之一》(1937年)。翌年秋，转到伦敦，在英国博物馆调查敦煌写本和汉文典籍。在调查敦煌写卷过程中，受到保管员翟林奈(L. Giles)的刁难，只检索了五百多号卷子。向先生把重点放在俗文学作品上，不仅抄录了许多材料，还为北图拍摄了不少照片。另外，向先生在伦敦还抄录了不少有关明末清初入华耶稣会士和太平天国的文献资料。1937年转赴柏林、巴黎，继续调查、抄录德国吐鲁番探险队从吐鲁番和西域其他地方攫取的写本和伯希和探险队所获敦煌文献资料，以及巴黎所存耶稣会士的有关资料。其所发表的调查结果，有《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1937年)、《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记巴黎藏本王宗载〈四夷馆考〉——瀛涯琐志之二》(1939年)等。

1938年，向达先生带着亲手抄写的几百万字资料回国，此时日寇已经占领祖国半壁江山。先生来到后方，先任教于内迁的浙江大学，随后转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1942年9月至1943年7月，参加重庆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北京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北史地考察团，任历史考古组组长，赴河西走廊特别是敦煌地区考察。1944年，再次往西北考察，对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玉门关、阳关故址等做了仔

细的调查，并多方寻觅、搜索留存敦煌当地的藏经洞出土文献，抄录其中有价值的部分，辑成《敦煌余录》两辑，所抄内容包括天宝地志、《占云气书》、《六祖坛经》、神会语录等重要的敦煌写本文献，以后陆续发表了这两次西行的考察结果：《玉门关阳关杂考》（1943年）、《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1944年）、《西征小记》（1947年）、《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1947年）等。先生在敦煌考察过程中，不满有些画家对敦煌壁画的破坏行为，痛惜敦煌保护现状不利的局面，以方回的笔名，在重庆《大公报》发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连带的几个问题》（1943年），对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立产生直接的影响。另外，向达先生对“敦煌学”的贡献，还有在此期间发表的力作《唐代俗讲考》（1944年）。抗战胜利后，向达先生随北京大学回到北京，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兼掌北大图书馆。

解放后，向达先生继续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等。1951年，曾有机会到新疆各地旅行，考察了许多新疆古代石窟寺和古代城址，撰有《新疆考古概况》（1953年）。此时，向达先生把中外关系史作为主要的研究课题，1957年刊出他自己选编的代表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论文集，收录他历年撰写的有关中外关系史、敦煌学和西域史的重要论文。同时，向达先生开始系统整理中外关系史料，以《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为名，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1957年“反右”运动中，向达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所兼任的北大图书馆馆长、中科院学部委员、历史所二所副所长等职均被撤销，仅仅保留的北大历史系教授的职称也从一级降为二级。但向先生仍专心致力于中外关系史籍的整理和研究，先后整理出版有《西洋番国志校注》

(1961年)、《两种海道针经校注》(1961年)、《郑和航海图》(1962年)、《蛮书校注》(1962年)。这方面的成果还应当包括《西游录校注》(1981年)、《〈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1981年),以及没有发表的玄奘《大唐西域记》校注稿(存北大图书馆)。另外,向达先生还在敦煌学领域继续耕耘,1950年与常书鸿等人合著《敦煌》,1957年与王重民、王庆菽、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合编《敦煌变文集》,还撰有《敦煌艺术概论》(1951年)、《记敦煌出六朝婆罗迷字因缘经经石幢残石》(1963年)等。

1966年11月26日,由于受到“文革”的冲击,向达先生过早地离开人世,年仅66岁。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是向达先生1956年4月编成,1957年4月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学术论文集,共收录1926年至1954年间撰写的论文23篇,其中第一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篇幅最长,所以即用此文的篇名作为书名。

向达先生在书前《作者致辞》中,根据书中所收论文的内容,大体上区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四篇,是有关唐代历史的;第二部分十篇,是有关“敦煌学”的;第三部分三篇,是有关佛教石刻和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洋美术的;第四部分六篇,是有关目录学的。事实上,有不少文章既可以归入唐史范畴,也可以放在中西交通史的领域,是属于“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以下略依向达先生的分类,介绍一下本书所收文章的内容和价值。

第一组论文是有关唐史的,其中包括唐代中外关系史、印刷史、南诏三个方面。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无疑是本书的最重要文章,也是最长的一篇文章,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该文选取唐代传入中国的西域文明与唐朝都城长安有关系者,分类整理,系统加以论述。

它所研究的主题，有流寓长安的西域人、西市胡店与胡姬、开元前后长安的胡化、西域传来的画派与乐舞、长安的打球活动、西亚新宗教的传入等六个子目，附录两篇，是《柘枝舞小考》和《盘屋大秦寺略记》。这篇文章从勾稽进入长安的西域各国使者、商人、胡姬等各色人物开始，进而揭示开元前后唐朝长安所受西域文化影响的情况，再具体研究西域绘画、乐舞、娱乐活动、宗教对长安文化的影响。除了前人所利用的传统文献资料外，向达先生十分重视使用新出土的墓志资料和文物材料，这样一方面大大补充了前人所辑昭武九姓粟特人的有关活动记载，另一方面也以文物材料形象地解释了西域文化在长安的表现。为此，本文配有部分图版，有中国出土文物，也有日本传存的唐代乐舞形象。《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是唐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的力作，此文不仅在内容所涉及的范围方面超过了前人，而且也有相当的深度，其所阐释的六个突出方面，迄今仍不断地被地下层出不穷的考古资料所证明。

《唐代刊书考》是研究唐朝雕版印刷的重要篇章，文章指出隋以前及隋代中国还没有发明雕版印刷，并对唐朝的印刷史做了简要的叙述，根据敦煌出土的材料，特别表彰了中国印刷史上的咸通时代。

其他两篇文章是关于南诏的史籍和南唐事实的考证和研究。

第二组论文是有关“敦煌学”的，包括敦煌写本调查、俗文学作品、敦煌史地。

向达先生是早期出国调查研究敦煌卷子的先行者之一，但受到保管员的刁难，没有能够像在巴黎的王重民先生那样通览所藏，而只过眼了五百余件。收入本书的《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是向达先生阅览时记下的简要目录，因为当时伦敦藏卷完全

没有公布，向先生的目录在一段时间里就成为人们利用查找伦敦藏卷的指南。1957年和1962年分别出版了翟林奈的《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和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收），由于著录的要点不同，向先生的这份《目录》仍然没有过时。而且，我们对比向目著录的内容和翟目、刘目所著录的全部伦敦藏卷内容，更可以看出向达先生所关注的问题所在。值得提到的是，向先生当时把这中间的重要文书都摄制了照片，交北京图书馆保存，可惜的是这批照片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6 向达先生对“敦煌学”的研究，是从研究敦煌出土俗文学作品开始的。最早发表的敦煌俗文学作品，是罗振玉刊布在《敦煌零拾》中的所谓“佛曲”。向达先生为了弄清佛曲的性质，先是追溯到音乐方面，提出了龟兹苏祇婆琵琶七调源于印度北宗音乐的假设，撰写了《龟兹苏祇婆琵琶七调考原》一文。并由此发现唐代的真正“佛曲”，与敦煌俗文学作品没有任何关系，他的《论唐代佛曲》一文，可以说是把敦煌俗文学作品的研究引入了正确的轨道。向达先生并不以此为研究的终点，而是继续反复研究俗文学作品的各种题材和演唱形式，并且结合在英、法所见到的新资料，特别是巴黎所藏P.3849背面俗讲仪式文，撰写《唐代俗讲考》，提倡把俗文学作品称做“俗讲”，并详细讨论了俗讲的分类、唐代寺院中俗讲的盛行、俗讲的仪式、俗讲的话本、俗讲文学的演变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等。虽然现在大多数学者习惯于使用郑振铎先生提出的“变文”一词来统称这些俗文学作品，但向达先生和孙楷第先生倡言的“俗讲”一名，仍然值得充分重视。此外，收入本书的《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一文，就是向达先生在伦敦收集敦煌俗讲资料的记录，这也为以后编辑《敦煌变文

集》做了准备。

向达先生的学术研究，十分重视实地考察。在研究唐代长安的西域文明时，就曾前往陕西整屋的大秦寺故址调查。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向达先生的“敦煌学”研究，也同样开拓了中国“敦煌学”的范围，从书桌走向田野。收入本书的《西征小记》、《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五篇文章，就是40年代向先生两次前往敦煌考察的学术收获。其中《西征小记》是对河西走廊古代遗址和遗留的敦煌写本的调查简记，尤详于敦煌石窟和当地留存的写本，有关当地所存敦煌写本的记录今天看来十分珍贵。《两关杂考》通过实地考察和对汉简、敦煌文书以及史籍记载的考证，研究了玉门关在汉唐间的迁徙的时间和位置。《莫高榆林二窟杂考》是用科学的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敦煌石窟的开拓性论文，其中第四节谈《敦煌佛教艺术与西域之关系》，更是指明了敦煌研究中一条光明大道，虽然以后数十年间由于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敦煌学界比较强调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向达先生在文中指出的壁画制度、粉本比例及其他相关问题、天竺传来的凹凸画法、绘画中的空间观念、曹氏归义军的画院等等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被学者们所重视，有的已经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可以告慰向先生在天之灵。《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是根据敦煌石窟的供养人题记和新见的敦煌文书资料，对罗振玉《补唐书张议潮传》所做的订正和补充，是归义军史研究的重要阶段性成果。向达先生在敦煌期间，细心访查，得以看到任子宜等当地文人家中秘藏的敦煌写本，其中如《逆次占》、《毛诗郑氏笺》、《文选》、《寿昌县地境》、《唐代地志》、《占云气书》、《三界寺经录》、《定是非论》、《坛语》、《坛经》等，都

是十分重要的典籍文献，有些还是敦煌卷子中的孤本。向先生全部抄录下来，有的还用其他敦煌写本做了校勘，如《坛经》等禅宗典籍，有的写有跋语。可惜的是他所辑成的《敦煌余录》一书一直没有能够出版，只发表了收入本书的《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一篇文章。这件文书首尾完整，专记沙州寿昌县的地理，因为唐高宗上元年间以后，寿昌县管辖范围远到西域的鄯善和且末，也就是今天的罗布泊和且末地区，所以这份保存完整的资料十分珍贵，而且可以补伦敦藏《沙州图经》卷五寿昌县部分残本的缺失部分。

8 第三组论文是关于美术史的，既有佛教石窟造像，也有传入中国的西洋画法。

《摄山佛教石刻小纪》和《摄山佛教石刻补纪》两文，是对南京东北栖霞山千佛岩石窟的考察记录，其中也详细讨论了隋文帝所建舍利塔的问题。而《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讨论的范围极广，从明清之际入华的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洋美术，进而说到西洋写真术、清初画院中的西洋画家、民间画家与西洋美术的关系，以及建筑所受西洋的影响和瓷器的西洋化问题。这组美术史的论文，在中国学术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组论文是关于目录学的，但从内容上看，有关于明清中西交往史籍的考证，有关于汉唐间西域南海地理书的叙录，有关于明清宝卷和秘密宗教问题的研究，还有海外所藏的中文书。

《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是对郑和家世和有关郑和下西洋资料的介绍和考订。《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是向达先生做这类地理书辑录的准备工作，但没有完成，《叙录》也只有上篇，但上篇所载都是已佚古籍的叙录，汇集了零散的资料，因此很有参考价值。《方玉润著述考》和《明清之际之宝

卷与白莲教》，表明向先生对目录学的熟悉。而《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和《记巴黎藏本王宗载〈四夷馆考〉》，是向先生调查海外中文书的重要记录，其中涉及的内容很多，特别是对牛津包德里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所藏中文书的记录，为后人的访查提供了很好的线索。

向达先生的这本论文集所收的论文，从性质上可以分成唐史、“敦煌学”、美术史、目录学四类；如果从内容上分，则主要是属于中西文化交流史和“敦煌学”的范围；这两个方面，正是向达先生对学术的最主要贡献。由于向达先生的研究是建立在丰富的历史、考古、美术、宗教、目录学等方面的渊博知识基础上的，又勤于做实地考察，并有机会到海外访查资料，所以能够随时获得新资料，发现新问题，取得新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看法。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是向达先生学术研究的代表作，充分反映了他在上述两个方面和相关领域的学术贡献。其中，《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长文是本世纪唐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当中的力作，迄今仍然是每一个研究唐史、中外关系史、长安历史的人所不可忽视的著作，常常被中外学者所引用。向达先生有关敦煌史地的一组论文，是用传统文献、敦煌文书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所取得的成果，涉及到敦煌史地、艺术、考古等许多方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研究课题，一直是敦煌学界努力奋斗的目标；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一直是敦煌学界行之有效的法宝。由于向达先生这部代表作蕴含着深邃的研究心得、广阔的学术天地、前瞻性的研究课题，因此确立了它在 20 世纪中国史学上不朽的地位。

作者致辞

这一本论文集一共收集了二十三篇论文。因为其中《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篇比较长一点，又放在卷首，于是就用这一篇的题目作为论文集的总名。

所有收集在这一本论文集里的文章，发表的时间始于一九二六年，止于一九五四年。论文性质都多少和中西交通史有点关系，按照内容，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自第一篇至第四篇，都和唐代历史有关，特别是唐代中外文化关系史和国内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第二部分，自第五篇至第十四篇，都是属于所谓“敦煌学”范围的文章。第三部分，自第十五篇至第十七篇，谈的是摄山佛教石刻和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洋美术。第四部分，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三篇，都是和目录学有关的一些文章。

从一九二六年到现在，整整三十年；照古老的说法，三十年要算一世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像我所研究的比较狭隘的一门，虽然只是历史科学巨流中的一个小小溪涧，也自有不少的变化和进步。举“敦煌学”为例。自一八九九年发现了敦煌石室的藏书以后，便在东方学的研究中添上了一个新的部门。我之参加了这一方面的研究，最初是从敦煌所出通俗文学入手的。开始接触到佛曲这样一个名词，于是追溯到音乐方面，提出了龟兹苏祇婆琵琶七调渊源于印度北宗音乐的假设。后来逐渐明白佛曲与敦煌所

出通俗文学中的变文是两回事，佛曲与龟兹乐有关，而变文一类的通俗文学乃是唐代通行的一种讲唱文学即俗讲文学的话本。一九三七年在巴黎看到纪载俗讲仪式的一个卷子，这一个问题算是比较满意地解决了。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得到机会去巡礼敦煌千佛洞，考察汉代的玉门关和阳关的遗址；一九五一年又去新疆，巡礼了古代高昌（今吐鲁番）、焉耆（今焉耆）、龟兹（今库车、拜城）诸地的石窟寺；于是对于“敦煌学”才算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距我开始作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来，“敦煌学”，特别是音乐和俗讲文学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大的进步。日本高楠顺次郎、法国伯希和和日本林谦三诸人根据印度的七调碑，证明了并且修正了我所提出的龟兹苏祇婆琵琶七调渊源于印度北宗音乐的假设。关于俗讲文学，郑振铎、王重民、孙楷第、任讷、周绍良、王庆菽诸位先生，在搜集、整理以及研究传布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工作，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尤其令人兴奋的是解放以后这些方面都焕然改观了。敦煌千佛洞设立了研究所了，石窟里面装上电灯了。西自天山，东至于海，所有的石窟寺都由国家进行保护了。敦煌发现的俗讲文学的话本也已汇集起来即将出版了。回想以前埋首伏案于伦敦、巴黎的图书馆中摸索敦煌残卷，以及匹马孤征，仆仆于惊沙大漠之间，深夜秉烛，独自欣赏六朝以及唐人的壁画，那种“撻埴索涂”、“空山寂历”的情形，真是如同隔世！但是今天我们的的心情不是过去的所谓“感慨系之”，而是“凡在见闻，莫不欣跃”！我想凡是参加过这一工作的朋友们，都会同意我的说法吧！

关于唐代历史的研究，陈寅恪、岑仲勉、贺昌群、唐长孺诸位先生都有很好的贡献。我只是参加文化史和中外关系特别是和